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及其行为表现的影响

作者：宋仕婕 佐斌 温芳芳 谭潇

第一轮

编委初审意见：

意见 1：论文关注群际敏感效应，即消极评价来源（内/外群体）对个体情绪反应的影响，同时考察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以及这种群体敏感效应的行为后效。论文研究问题明确，文献综述详实，推理清晰有逻辑，研究设计合理，统计分析得当，研究结果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还有一些小问题：1.文章题目“我们说可以，但你不行”略显突兀，若无引言介绍及上下文，很难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建议改写或删除。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建议。文章题目确实略显突兀和口语化，我们讨论决定删除“我们说可以，但你不行”，修改后的文章题目为“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及其行为表现的影响”，相应的英文标题也进行了修改。

意见 2：引言开篇有关雾霾问题中西方报道的事件与本研究主题不符。混淆了消极评价来源（中、西方）和消极评价程度（西方消极诋毁，中方客观分析）的影响，本研究仅关注消极评价来源，在实验中也控制了两种来源消极评价的内容和程度，建议引言开篇换一个更贴切的社会现象。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指正。开篇的雾霾问题忽视了事件本身的负性与西方报道立场的诋毁，确实不太恰当。我们决定删除这一例子，在引言开篇增加群体评价和个体关系的表述，承接后文逻辑“对群体的消极评价很重要——不同来源的群体消极评价会造成不一样的后果”，这样行文更加顺畅。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删除：2015 年 12 月，北京市两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雾霾成为中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法新社、美联社等西方媒体以此事件为背景进行报道，对中国治污取得的成效表示质疑。同时，中国人民网和新华社等报道了中国重污染省份在阵痛中寻求转型等主题的文章。同样是对空气污染问题的报道，西方媒体带着对中国的偏见渲染中国环境问题，刻意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媒体则相对客观和平衡，更容易让人接受。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感受。这一事件暗含了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即不同来源身份的消极评价会引发人们截然不同的心理感受。虽然有一些研究探讨了这一差异现象，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心理因素以及后果尚未得到完全解释。本研究立足群际敏感效应理论，从群际互动和群

体认同的视角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探究。

增加：群际互动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其所属群体的价值评价(Abrams & Hogg, 2004)。因此，他人对个体所在群体的看法会影响其自我概念，甚至在群际互动中的情感和态度，更严重的群体污名或消极的群体评价可能会对个体自尊以及威胁情境中的行为产生不良影响(Jetten & Hornsey, 2014; Smart-Richman, Blodorn, & Major, 2016)。本研究立足群际敏感效应理论，从群体认同的视角考察消极群体评价对个体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理解群际互动中个体的心理及行为反应模式提供支持与参考。

Abrams, D., & Hogg, M. A.(2004). Collective identity: Group membership and self-conception. In M. B. Brewer & M. Hewstone (Eds.), *Self and social identity* (pp. 147–181).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Jetten, J., & Hornsey, M. J. (2014). Deviance and dissent in group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 461–485.

Smart Richman, L., Blodorn, A., & Major, B. (2016). An identity-based motivational model of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9(4), 415–425.

意见 3：研究 1 和研究 3 的测量工具（消极情绪反应、群体认同）未报告信度。

回应：多谢编委专家细心指出，最新修改稿中补充了各实验中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详见原文。

意见 4：建议在前言假设部分画出变量模型图（如图 4），而在研究 3 中报告带有结果路径系数的模型图。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建议，已将假设模型图挪到前言假设部分，另外在实验 3 中增加了有路径系数的模型图（见图 5）。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在国际群际关系复杂矛盾丛生的现实背景下，研究关注了群际敏感性效应及其边界条件和结果，整体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具体研究设计和执行过程科学合理，结果可靠，写作规范流畅。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思路和逻辑上的。

意见 1：首先，研究一与研究二三的逻辑关联问题。整个研究着重于检验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研究二和三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但研究一看上去与之脱节，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研究一

没有去检验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而在于研究一使用的范式是假想的群体，个体可能很难对一个想象中的虚拟群体产生差异性的群体认同，换句话说如果把作者假设的群体认同的重要作用放到研究一里可能并不适用，这使得研究一仅仅起到了一个重复前人研究结果的作用，在逻辑上与后两个研究是割裂的。因此作者应该更清晰地论证几个研究的内在关系，以及研究一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根据专家建议，作者进一步阅读相关文献，将全文的思路和逻辑进行了认真思考与梳理。整体来看，本研究的三个实验呈现递进的关系，通过实验一验证群际敏感效应的存在，在基于情境激活的最简群体身份中拓展其适用性；实验二从个体因素层面考察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的调节作用，实验三进一步探索群际敏感效应的行为后效及内部作用机制。**鉴于此，实验一研究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国外关于群际敏感效应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但国内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探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否有群际敏感效应及其会呈现什么样特点尚不明确。有关自我和群体关系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东亚文化中的个体比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更容易受内群体成员观点的影响(Cohen & Gunz, 2002; Zaroff, D'Amato, & Bender, 2014)，并且，中国具有较高的自我批评氛围，内部的批评和异议对社会群体发展与完善具有激发作用(章若昆, 郭永玉, 2009)。这暗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来自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评价会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而来自外群体的消极评价所构成的群际威胁则可能导致更加消极的情绪反应(吕行, 钟年, 田波, 舒首立, 2017)。因此有必要在中国被试中对群际敏感效应进行重复性验证，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内部机制和行为后效的探索。这也是作者考虑的实验一和实验二、三的关系。

（2）最简群体范式是研究群际关系和群体互动行为最有影响力的范式之一，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纯净的分类群体，剥离其他身份角色的干扰(Otten, 2016; 温芳芳, 佐斌, 2018)，而想象程序(imagination procedure)操作能够排除对真实群体的先前信念的混淆从而做出更好的因果关系检验(Cuddy, Fiske, & Glick, 2007)。若群际敏感效应可在基于想象情境激活最简群体身份中依然成立，则可进一步证明其普适性并应用到更多的群体身份上，为后续开展群际敏感效应的相关研究提供简单可行的实验范式和实证依据。

我们认真思考了评审专家的意见，参考专家的建议，我们对引言中提及实验一的部分做了补充，并补充了**实验 1a 现实群体分类中的群际敏感效应**。**实验 1a 现实群体分类中的群际敏感效应和实验 1b 最简群体分类中的群际敏感效应（原实验 1）**共同对群际敏感效应理论在跨文化的一致性，和最简群体身份中的普适性上进行论证，以此为基线进一步考察不同来源身份的消极群体评价对个体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据此，实验 1a 和 1b 的意义在于首次在中国被试中进行本土化检验，考察其跨文化的一致性；并通过证明其在最简群体中存在，进一步拓展群际敏感效应理论的普适性和解释边界。**文中具体修改如下：**

引言部分：

“群际敏感效应被证明在国家(Adelman & Dasgupta, 2019; Rabinovich & Morton, 2012)、

宗教(Ariyanto, Hornsey, & Gallois, 2010)、性别(de Hoog, 2013)等多个群体身份背景下都有较好的稳定性。这些研究一致发现,即使是相同的消极内容,来自外群体的评价比来自内群体的评价更能引起消极的情绪、更不公平和更缺乏建设性,而国内尚未有研究对这一效应进行探讨。有关自我和群体关系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东亚文化中的个体比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更容易受内群体成员观点的影响(Cohen & Gunz, 2002; Zaroff, D'Amato, & Bender, 2014),并且,中国具有较高的自我批评氛围,内部的批评和异议对社会群体发展与完善具有激发作用(章若昆, 郭永玉, 2009)。这暗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来自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评价会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而来自外群体的消极评价所构成的群际威胁则可能导致更加消极的情绪反应(吕行, 钟年, 田波, 舒首立, 2017)。因此,有必要对群际敏感效应在中国被试中进行本土化检验,以确定其跨文化的一致性。

此外,除了客观现实群体分类,在特定社会情境中激活的内外群体身份也会对群际互动和个体反应发挥重要作用(Weisbuch & Ambady, 2008)。最早有关群体偏好的研究发现,即使是随机形成的最简群体,也会对群体成员的感知产生强大影响(Tajfel, Billig, Bundy, & Flament, 1971; 温芳芳, 佐斌, 2018)。想象程序(imagination procedure)操作能够排除对真实群体的先前信念的混淆从而做出更好的因果关系检验(Cuddy, Fiske, & Glick, 2007),那么,基于最简群体范式操作的想象群体身份是否可以重复验证群际敏感效应,对进一步探讨群际敏感效应理论的普适性和解释边界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采用客观现实群体和最简群体两种范式,在更广泛的群体分类互动情境中检验群际敏感效应,并以此为基线进一步考察不同来源身份的消极群体评价对个体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

实验部分:

“2.1 实验 1a 现实群体分类中的群际敏感效应

2.1.1 目的

实验 1a 拟基于现实群体分类对群际敏感效应进行本土化检验,考察中国被试对不同来源身份的消极群体评价的情绪反应差异。

2.1.2 方法

(1) 被试

随机选取某高校大学生 93 人,其中男性 36 名,女性 57 名,平均年龄 20.87 岁($SD=2.11$)。

(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消极评价的来源身份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因变量为被试的消极情绪反应。

(3) 实验材料与程序

研究采用学校作为现实形成的内外群体分类情境,实验材料改编自 Hornsey 等人(2009)研究中以国家为背景的消极群体评价。首先,给被试呈现一则该地区高校论坛“报考交流”板块的帖子截图,内容为某位新人提问“H 大学(为被试所在学校)如何? H 大学的学生毕

业后职业前景怎么样？”评论里由一位来自本校（或外校 K 大学）的同学对被试所在学校做出消极的评价。消极评价来源身份为内群体时，被试阅读的评论为：H 大学不怎么样，体制僵化，形式化严重，在这儿读书不会有什么收获。H 大学的学生都比较不思进取，专业能力不足，毕业之后找工作也很难，就业面狭窄，技能水平也不够。当消极评价来源身份为外群体时，被试阅读的材料相同，只是评价者身份不同。随后要求被试对于上述评价的情绪感受在“生气的、难过的、恼怒的、受侮辱的”四种情绪体验(Hornsey, 2002; Adelman & Dasgupta, 2019)上进行 0~100 评分，评分的均值作为消极情绪反应程度的指标，本实验中情绪测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2。

2.1.3 结果

以消极评价的来源身份（内群体、外群体）为自变量，被试的情绪反应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被试对来自外群体消极评价的消极情绪反应($M=67.21$, $SD=23.60$)显著高于对来自内群体消极评价的消极情绪反应($M=48.07$, $SD=19.44$)， $t(91)=4.26$, $p<0.001$, $d=0.88$ 。

2.1.4 讨论

实验 1a 的结果证明，在以学校作为区分内外群体身份的互动情境中，来自外群体的消极评价会导致更加生气、难过、恼怒以及受侮辱的消极情绪反应。表明人们对来自外群体的批评更加敏感，而对于内群体的批评则相对包容，这与国外群际敏感效应的研究结果相一致(Thai et al., 2019)。群体身份作为推断评价者动机的一种启发式线索影响了个体对不同来源的消极评价所做出的反应，来自外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被认为带有敌意和偏见，而来自内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则更具建设性。”

参考文献：

- Adelman, L., & Dasgupta, N. (2019). Effect of threat and social identity on reactions to ingroup criticism: defensiveness, openness, and a remed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5), 740–753.
- Ariyanto, A., Hornsey, M. J., & Gallois, C. (2010). United we stand: Intergroup conflict moderates the intergroup sensitivity effe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 169–177.
- Cohen, D., & Gunz, A. (2002). As seen by the other...: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 in the memories and emotional perceptions of Easterners and Western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1), 55–59.
- Cuddy, A. J. C., Fiske, S. T., & Glick, P. (2007). The BIAS Map: 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631–648.
- de Hoog, N. (2013). Processing of social identity threats: A defense motivation perspective. *Social Psychology*, 44, 361–372.
- Lv, X., Zhong, N., Tian, B., & Shu, S. L. (2017).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group Threat on Collective Self-Esteem: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wo Kinds of Emotion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0(3), 632–637.

- [吕行, 钟年, 田波, 舒首立. (2017). 不同群际威胁类型对集体自尊的影响: 愤怒和自卑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40(3), 632–637.]
- Rabinovich, A., & Morton, T. A. (2012). Sizing fish and ponds: The joint effects of individual-and group-based feedback.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1), 244–249.
- Otten, S. (2016). The minimal group paradigm and its maximal impact in research on social categoriza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1, 85–89.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7). Monterey, CA: Brooks/Cole.
- Thai, M., Borgella, A. M., & Sanchez, M. S. (2019). It's only funny if we say it: Disparagement humor is better received if it originates from a member of the group being disparage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5, 103838.
- Weisbuch, M., & Ambady, N. (2008). Affective divergence: automatic responses to others' emotions depend on group member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5), 1063–1079.
- Wen, F. F., & Zuo, B. (2018). The minimal group paradigm: Oper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new applica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1(3), 713–719.
- [温芳芳, 佐斌. (2018). 最简群体范式的操作, 心理机制及新应用. *心理科学*, 41(3), 713–719.]
- Zaroff, C., D'Amato, R. C., & Bender, H. A. (2014).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across the lifespan: Compar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Neuropsychology of Asians and Asian-Americans* (pp. 91–116). Springer, New York, NY.
- Zhang, R. K., & Guo, Y. Y. (2009).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self-criticism personality.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5(6), 15–21.
- [章若昆, 郭永玉. (2009). 自我批评人格及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5(6), 15–21.]

意见 2: 其次, 整个研究的核心问题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是从调和现有研究结果矛盾的角度来提出的, 但从文中的推导过程来看, 有令人困惑的地方。在“对于群际敏感效应的产生机制有两种存在争论的理论解释……”这段里, 作者认为社会认同理论的解释和社会规范理论的解释是矛盾的, 进而推导出如果前者正确就应该存在认同调节而如果后者正确就应该不存在认同调节的推测, 然而这是有问题的。很显然, 与 ISE 相关的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针对的是内群体成员, 所以才有所谓的群体身份和认同可言, 而与之相关的社会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的是旁观者, 其中根本就不涉及到群体认同的问题, 且旁观者也存在 ISE 与高认同的内群体成员可能表现出更高的 ISE 完全不冲突, 换言之很可能内群体成员走的是群体认同的通路而旁观者走的是社会规范的通路, 因此个人认为无法推导出两种理论矛盾的结论, 且本研究没有涉及到旁观者视角, 其结果也无法说明社会规范理论的解释无效。也就是说, 研究主要问题提出的逻辑起点是不够充分和令人信服的, 建议作者重新梳理逻辑, 更好地说明研究意

义（在不少研究已经证明了内群体成员的群体认同对于 ISE 具有调节作用的情况下）。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专家对我们的论文指出的逻辑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进一步研读了相关文献，思考了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的观点。的确如评审专家所言，这两个理论是从不同的视角但并不是一种矛盾的关系，而我们原来的表述有不准确之处。

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都可以对群际敏感效应做出解释。有研究者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认为外群体的批评对内群体身份构成了威胁，被看作是出于敌意和竞争的动机，从而采取防御性的应对，所以外群体的批评会导致内群体成员出现更加消极的情绪反应(de Hoog, 2013; Hornsey & Imani, 2004)；而支持社会规范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外群体的批评是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会引起内群体成员对群体间偏见的直接感知，从而采取更加消极的情绪应对。但对于内群体成员而言，群体身份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很难区分开，因此有研究者在旁观者而不是群体成员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一效应依然存在；由于旁观者不涉及被批评的群体身份，所以证明群际敏感效应是社会规范的影响结果(Sutton, Elder, & Douglas, 2006; Sutton, Douglas, Elder, & Tarrant, 2008)。

因此，使用“旁观者”作为被试只是上述研究者的实验方法而非关注的重点。我们在论文中引用“旁观者”的实验结果来论证社会规范理论确实不妥，可能引起误解，让读者感觉内群体成员的群际敏感效应走的社会认同通路，而旁观者的反应走的社会规范通路。

一些研究表明，社会规范的影响在内群体成员身上同样存在。Sutton 等人(2006)的研究证明被试认为来自群体内部的批评更加恰当，他们个人也更愿意表达对内群体的消极评价，并倾向于对内部批评做出更积极的回应（研究 3）。实验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内外群体身份情境，而是比较抽象的概括。例如：表达批评意愿方面其中一个问题表述为“*How willing would you be to voice criticism of a group to which you belong?*”和“*How willing would you be to voice criticism of a group to which you do not belong?*”，被试倾向于批评内群体的意愿显著高于非内群体。这表明内群体成员对待内群体消极评价的态度同样会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即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做出评价更容易接受，否则就会被视为冒犯和违背社会规范(Lindner, Nosek, 2009)。并且，一项新近研究发现，社会规范的影响在贬损性幽默的背景下同样适用：贬损性幽默如果来自被贬损的内群体成员而不是来自外部群体成员的情况下，可能会更受欢迎，因为来自外群体的贬损性幽默被认为不道德而构成社会侵犯(Thai, Borgella, & Sanchez, 2019)。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规范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为解释群际敏感效应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社会规范理论可以同时解释内群体成员和旁观者对外群体消极评价的反应，社会认同理论可以解释内群体成员的反应；由此研究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对综合两种理论观点来进一步探索群际敏感效应的解释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群体认同高的成员在面对消极群体评价时会感受到更高的身份威胁，其群际敏感效应可能比群体认同低的成员更加明显，即存在调节作用；而根据社会规范理论的观点，

无论其群体认同水平高低,因为来自外群体的消极评价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都可能会导致群际敏感效应。因此,群体认同水平的高低,是否能够对群际敏感效应发挥调节作用,需要进行进一步验证。

此外,在以往文献中,有研究者从群体认同的角度出发探索了消极评价发出者的群体认同对接收者情绪反应的影响,发现来自内群体低认同者的消极评价同样会引起负面的反应,由此确定了评价者的是否具有建设性的动机决定了人们对消极评价的应对(Hornsey & Imani, 2004)。还有研究考察观众如何影响人们对内部批评的反应时,发现当内部批评表达给外群体观众的条件下,高群体认同者相比低群体认同者对批评的内容会更少反驳,因为高认同者倾向于站在群体的角度应对身份威胁,承认并解决群体的缺点可以保护群体免受进一步的攻击,但这项研究并未证明群体认同在面对来自外群体消极评价时所发挥的作用(Hornsey, Bruijn, Creed, Allen, Ariyanto, & Svensson, 2005)。

上述两项研究虽然都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考察了群体认同在影响人们对群体批评的反应中扮演的角色,但却忽略了高低群体认同的个体在应对不同来源身份的消极群体评价时的反应差异,因此本研究的创新点还在于直接检验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的影响。

参考专家的意见,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逻辑进行了新的梳理,修改了引言中认为两种理论“存在争论”或矛盾的表述,对研究群体认同调节作用的必要性以及调节方向做了进一步论证。文中具体修改如下:

“以往研究有两种理论对群际敏感效应的产生机制提供了一定的解释。一种是基于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的群体身份理论,Hornsey 等人支持群际敏感效应是群体身份本身所导致的,因为外群体的批评对群体身份构成了威胁,被看作是出于敌意和竞争的动机,从而采取防御性的应对(de Hoog, 2013; Hornsey & Imani, 2004)。另一种是社会规范理论(Social Norm Theory),Sutton 等人认为对外群体的批评是违反社会规范的,例如偏见和歧视也通常是不被社会许可的,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来自内部的批评,而外部的批评则被视为冒犯和违背社会规范(Sutton, Elder, & Douglas, 2006; Lindner, Nosek, 2009)。因此,是对违反规范的感知而不是消极评价的身份感知决定了人们对批评的反应(Sutton, Douglas, Elder, & Tarrant, 2008)。这两种理论解释显著的不同在于被评价者的群体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是否会对评价反应产生影响。根据群体身份理论的解释,群体认同可能是影响个体对消极群体评价反应的重要因素,群体认同高的成员在面对消极群体评价时会感受到更高的身份威胁,其群际敏感效应可能比群体认同低的成员更加明显;而根据社会规范理论的观点,无论其群体认同水平高低,因为来自外群体的消极评价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都可能会导致群际敏感效应。因此,结合这两种理论,群体认同水平对群际敏感效应的影响调节作用,有必要进行精细化探讨。

有关群际敏感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发现,在群体间的环境特征上,公开的消极评价相比非公开的消极评价(Hornsey, Bruijn, Creed, Allen, Ariyanto, & Svensson, 2005),以及群体间

冲突明显相比冲突不明显时(Ariyanto et al., 2010), 都会导致评价接收者更强的防御。在消极评价的性质上, 批评的归因方式(Rabinovich & Morton, 2010)、语言的抽象或具体水平(Moscattelli, Prati, & Rubini, 2019)也会影响群际敏感效应的强弱。此外, 评价者在进行消极评价的同时强调群体的积极方面(糖衣炮弹)或使用包容性的语言, 也可以缓和消极评价的负面效应(Hornsey, Robson, Smith, Sutton, & Esposito, 2008)。这些研究在影响群际敏感效应强弱的外部边界条件上进行了较好的拓展, 但对个体应对评价的心理变量却关注不足。尽管一些研究者提出假设认为个体层面的因素(如态度和价值观)可能影响群际敏感效应的强度(Rabinovich & Morton, 2012), 但仍缺乏实证研究验证。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 群体认同会影响个体自我系统中群体属性内化的程度(Tajfel & Turner, 1979; 张莹瑞, 佐斌, 2006), 人们对内群体的认同感越强, 越能感受到自己与群体的紧密联结(Hogg, 2016)。在社会认同威胁情境(social identity threat)中, 高认同者更倾向于采用集体策略, 将群体利益作为情绪及行为反应的目标; 而低认同者则更多使用个体策略, 从个体的角度做出判断和反应(管健, 2011; Zagefka, Binder, Brown, & Hancock, 2013)。以往研究发现低群体认同者面对群体的消极评价时, 甚至会尝试脱离群体, 建立新的有价值的社会认同(Jetten, Tsivrikos, & Young, 2008; Tausch, Saguy, & Bryson, 2015), 这意味着低群体认同个体无论收到来自内群体还是外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 都会在心理上与群体建立疏离感来提升个体自尊的需要。相对而言, 高群体认同个体对来自外群体和内群体的消极评价敏感程度存在差异, 高认同者将自己与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来自外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直接威胁了他们的群体身份感知, 破坏了内群体的形象和利益, 使其产生外部导向的敌意情绪; 而内群体的消极评价被视为出于建设性的动机, 高认同者更倾向与群体成员保持一致, 通过集体努力来应对和改善群体的不足(Hornsey, Bruijn, Creed, Allen, Ariyanto, & Svensson, 2005)。因此, 从群体认同的角度考察不同来源的消极群体评价对个体的影响, 不仅可以对群际敏感效应的形成过程做认知路径的补充, 也可以综合“群体身份”和“违背规范”两种视角的观点, 进一步明确群际敏感效应的解释机制。”

参考文献:

- Guan, J. (2011). Complexities of social identity and strategies for social identi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 98–104.
- [管健. (2011). 社会认同复杂性与认同管理策略探析.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02), 98–104.]
- de Hoog, N. (2013). Processing of social identity threats: A defense motivation perspective. *Social Psychology*, 44, 361–372.
- Hornsey, M. J., & Imani, A. (2004). Criticizing groups from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An identity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group sensitivity effe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365–383.
- Hornsey, M. J., de Bruijn, P., Creed, J., Allen, J., Ariyanto, A., & Svensson, A. (2005). Keeping it in-house: How audience affects responses to group critic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 291–312.

- Jetten, J., Iyer, A., Tsivrikos, D., & Young, B. M. (2008). When is individual mobility costly? 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identity fac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5), 866–879.
- Lindner, N. M., & Nosek, B. A. (2009). Alienable speech: Ideological varia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free-speech principles. *Political Psychology*, 30(1), 67–92.
- Sutton, R. M., Douglas, K. M., Elder, T. J., & Tarrant, M. (2008).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nvention in responses to criticisms of groups. In Y. Kashima, K. Fiedler, & P. Freytag (Eds.), *Stereotype dynamics: Language-based approaches to stereotype formation, maintenance, and transformation* (pp. 345–372). New York, NY: Lawrence Erlbaum.
- Sutton, R. M., Elder, T. J., & Douglas, K. M. (2006). Reactions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criticism of outgroups: Social convention in the intergroup sensitivity effe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563–575.
- Tausch, N., Saguy, T., & Bryson, J. (2015). How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affect social change? Its impact on collective action and individual mobility intentions among members of a disadvantaged group.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1(3), 536–553.
- Thai, M., Borgella, A. M., & Sanchez, M. S. (2019). It's only funny if we say it: Disparagement humor is better received if it originates from a member of the group being disparage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5, 103838.
- Zagefka, H., Binder, J., Brown, R., & Hancock, L. (2013). Who is to bla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is moderated by ingroup attributions. *Social Psychology*, 44(6), 398–407.

意见 3：此外还有一些细节问题：

- （1）研究假设的表述应更明确，如调节作用具体是怎样的调节作用，产生影响具体是怎样的影响，另外图上应标明路径的方向，变量名也可以更精准，如情绪的效价。
- （2）研究二三中消极情绪的测量没有说清楚，测了哪些消极情绪，用什么工具测的，建议予以补充。
- （3）存在少量错别字，如讨论最后一段中的“权利”应为“权力”。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 （1）我们在引言中增加了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产生调节作用的论述，并在研究假设中补充了调节作用的方向。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模型图中变量名和路径进行了更清晰地修改，如“情绪反应”改为“消极情绪”。
- （2）研究中消极情绪的测量材料来自于 Adelman 和 Dasgupta(2019)的研究，是群际敏感效应研究惯用的情绪体验（生气的、难过的、恼怒的、受侮辱的）测量，由于实验 1b、2、3 和实验 1a 所用材料一致，所以只在实验 1a 中进行了说明。参考专家的建议，我们在

每个实验中补充了具体的材料。

(3) 多谢审稿专家细心指出！已对全文进行了挑剔性阅读，将文中错别字进行了修改。

.....

审稿人 2 意见：

论文从社会认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考察了群体认同如何影响群际敏感效应在情绪和行为中的表现及相关作用机制，子研究之间的逻辑思路清晰，统计方法使用准确，并对初审意见做出了合理的回应。但还有一些小的问题，可以使论文更加完善：

意见 1：对于群体认同影响群际敏感效应的论证。在论证中，研究者基于社会认同模型，提出群际敏感效应在高群体认同者中的表现更加明显。根据引言，群际敏感效应源于：来自内群体的批评被认为是出于为群体利益考虑的建设性动机，而外群体的批评则是出于敌意和竞争的动机，按照这一观点，群际敏感效应不仅表现为负面评价对情绪的消极影响，更反映在评价来源的差异作用上；而在引言和讨论中，群体认同的作用为：群体认同增强了个体与群体的联结感，群体认同高的成员在面对消极群体评价时会感受到更高的身份威胁（引言第 4、5 段）；对于高群体认同者，群体的消极评价等同于对自我的消极评价（讨论 5.2），这一表述中肯定了群体认同会增强负面评价的影响，但没有论证评价的来源（内、外群体）如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引言可以很好地解释群体认同的主效应，但是对于与来源身份的交互作用，似乎需要补充一些更明确的理论说明。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仔细地阅读与宝贵的意见！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在文章引言和讨论部分增加了群体认同调节作用的论证，并在假设中补充了具体的交互作用方向。**文中具体修改如下：**

引言部分：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群体认同会影响个体自我系统中群体属性内化的程度 (Tajfel & Turner, 1979; 张莹瑞, 佐斌, 2006)，人们对内群体的认同感越强，越能感受到自己与群体的紧密联结(Hogg, 2016)。在社会认同威胁情境(social identity threat)中，高认同者更倾向于采用集体策略，将群体利益作为情绪及行为反应的目标；而低认同者则更多使用个体策略，从个体的角度做出判断和反应(管健, 2011; Zagefka, Binder, Brown, & Hancock, 2013)。以往研究发现低群体认同者面对群体的消极评价时，甚至会尝试脱离群体，建立新的有价值的社会认同(Jetten, Tsivrikos, & Young, 2008; Tausch, Saguy, & Bryson, 2015)，这意味着低群体认同个体无论收到来自内群体还是外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都会在心理上与群体建立疏离感来提升个体自尊的需要。相对而言，高群体认同个体对来自外群体和内群体的消极评价敏感程度存在差异，高认同者将自己与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自外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直接威胁了他们的群体身份感知，破坏了内群体的形象和利益，使其产生外部导向的敌意情绪；

而内群体的消极评价被视为出于建设性的动机,高认同者更倾向与群体成员保持一致,通过集体努力来应对和改善群体的不足(Hornsey et al., 2005)。因此,从群体认同的角度考察不同来源的消极群体评价对个体的影响,不仅可以对群际敏感效应的形成过程做认知路径的补充,也可以综合“群体身份”和“违背规范”两种视角的理论观点,进一步明确群际敏感效应的解释机制。”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现实群体情境和最简群体情境中均能证明群际敏感效应的存在,不同来源身份的消极群体评价对个体情绪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个体对来自外群体的评价有更加强烈的消极情绪反应;(2)群体认同在不同来源身份的消极群体评价与情绪反应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对低群体认同者而言,无论消极群体评价来自内群体还是外群体均有较低的消极情绪;而对于高群体认同者而言,对来自外群体成员的消极群体评价有较高的消极情绪,对来自内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消极情绪水平较低;(3)不同来源身份的消极群体评价和群体认同还会对个体的内群体积极行为产生影响,消极情绪对此起中介作用(见图1)”

讨论部分:

5.2 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的影响

以往研究在群体间的环境特征和消极评价的性质上对影响群际敏感效应强弱的调节因素进行了探索,本研究从个体层面提出群体认同这一变量,考察其在个体评价反应中的影响。实验2证明了群体认同高的成员会对消极的群体评价产生更多消极情绪,且相比群体认同低的成员,高群体认同者对来自外群体的消极评价感受会更加消极。同样的,实验3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高群体认同会增强群际敏感效应,而低群体认同者身上这一效应并不明显。这一结果符合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假设,即群体内成员会通过对外群体比较来维护所属群体的积极形象,对群体高度投入的个体尤其如此(Ellemer, 2012)。对于高群体认同者,其群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来自外群体的消极评价对其所属群体构成现实威胁,群体身份所赋予的情感与价值意义使其有更强烈的动机维护自己的群体(王勃, 俞国良, 2016);同样,面对来自内部的消极评价,高认同者倾向于从群体的角度做出判断和反应,对内部的批评和异议表现得相对包容和谅解,有利于促进群体的内部团结而获得长远发展。相反,对于低群体认同者,其个体利益大于群体利益,面对群体的消极评价时会在心理上与群体保持距离以维护自尊需要,从而表现出较低的负面情绪(Martiny & Nikitin, 2019)。此外,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也支持了群体身份对群际敏感效应的解释,个体对来自外群体消极评价的负面反应并不是由于对方违背了社会规范,而是对方威胁和侵犯了内群体的利益(Hornsey & Esposito, 2009; Sutton et al., 2006)。

参考文献:

Guan, J. (2011). Complexities of social identity and strategies for social identi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 98–104.

[管健. (2011). 社会认同复杂性与认同管理策略探析.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2), 98–104.]

- Hogg, M. A. (2016). Social identity theory. In S. McKeown, R. Haji, & N. Ferguson (Eds.), *Understanding peace and conflict through social identity theory: Contemporary global perspectives* (pp. 3–17).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 Hornsey, M. J., de Bruijn, P., Creed, J., Allen, J., Ariyanto, A., & Svensson, A. (2005). Keeping it in-house: How audience affects responses to group critic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 291–312.
- Jetten, J., Iyer, A., Tsivrikos, D., & Young, B. M. (2008). When is individual mobility costly? 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identity fac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5), 866–879.
- Lindner, N. M., & Nosek, B. A. (2009). Alienable speech: Ideological varia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free-speech principles. *Political Psychology*, 30(1), 67–92.
- Martiny, S. E., & Nikitin, J. (2019). Social identity threa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ctivating negative stereotypes decreases social approach motiv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25(1), 117.
- Sutton, R. M., Elder, T. J., & Douglas, K. M. (2006). Reactions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criticism of outgroups: Social convention in the intergroup sensitivity effe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563–575.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7). Monterey, CA: Brooks/Cole.
- Tausch, N., Saguy, T., & Bryson, J. (2015). How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affect social change? Its impact on collective action and individual mobility intentions among members of a disadvantaged group.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1(3), 536–553.
- Zagefka, H., Binder, J., Brown, R., & Hancock, L. (2013). Who is to bla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is moderated by ingroup attributions. *Social Psychology*, 44(6), 398–407.
- Zhang, Y., & Zuo, B. (2006).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03), 475–480.
- [张莹瑞, 佐斌. (2006). 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14(03), 475–480.]

意见 2：实验 3 内群体积极行为的阅读材料中提到“许多校友通过捐赠教育发展基金回报母校、帮助学子，从而推进学校教育事业长远发展”，该语句包含了描述性的群体规范：“许多”校友都选择了帮助母校，那么高、低群体认同个体，在行为上的差异，是否也源于其受描述性规范的影响不同，而非全然出于对消极评价的应对，部分地影响了实验结果？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

实验 3 内群体积极行为的阅读材料“许多校友通过捐赠教育发展基金回报母校、帮助学子，从而推进学校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包含了描述性的群体规范，有从众的成分，可能给被试造成规范性刻板影响。为了进一步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我们将指导语去掉了

这一表述，并进行了补充实验。修改后的内群体积极行为阅读材料为“现在想象你已经从学校毕业，并且工作许多年了，你的经济收入处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你愿意把你每年收入的多大比例捐献给母校的教育发展事业呢？”请被试在 1 (0%)到 8 (25%及以上)之间估计可能的选择。

首先，我们选取大学生被试 138 名，其中男生 43 人，女生 95 人，平均年龄 21.59 岁 ($SD=2.42$)。然后按照实验 3 的程序对被试进行施测，内群体积极行为的测量采用修改后的指导语。实验中群体认同和情绪测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88 和 0.90。依据被试群体认同的平均数为临界值，将被试分为高认同($n=69$, $M_{高}=5.62$, $SD_{高}=0.58$)和低认同($n=69$, $M_{低}=3.91$, $SD_{低}=0.63$)两组，两组被试的群体认同得分差异显著， $t(136)=16.49$, $p<0.001$, $d=2.82$ 。

然后，以消极评价的来源身份（内群体、外群体）和群体认同（高认同、低认同）为自变量，被试的消极情绪反应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来源身份的主效应显著， $F(1, 134)=31.88$, $p<0.001$, $\eta^2=0.19$ ，来自外群体评价的消极情绪反应显著高于对来自内群体评价的反应；群体认同的主效应显著， $F(1, 134)=66.25$, $p<0.001$, $\eta^2=0.33$ ，高群体认同个体的消极情绪反应显著高于低群体认同的个体；交互作用显著($F(1, 134)=14.95$, $p<0.001$, $\eta^2=0.14$)。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群体认同者对来自外群体消极评价的消极情绪反应($M=83.80$, $SD=2.46$)比来自内群体消极评价的消极情绪反应($M=57.63$, $SD=2.64$)更加强烈 $F(1, 68)=52.65$, $p<0.001$, $\eta^2=0.28$ ；低群体认同者对两种来源引起的消极情绪反应不存在差异($p=0.47$)。

接着，以消极评价的来源身份和群体认同为自变量，被试的内群体积极行为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来源身份的主效应显著， $F(1, 134)=36.24$, $p<0.001$, $\eta^2=0.21$ ，外群体消极评价会导致更多的内群体积极行为；群体认同的主效应显著， $F(1, 134)=32.16$, $p<0.001$, $\eta^2=0.19$ ，高群体认同个体的内群体积极行为显著高于低群体认同的个体。交互作用显著($F(1, 134)=16.09$, $p<0.001$, $\eta^2=0.10$)。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相比经历内群体消极评价后的内群体积极行为($M=3.90$, $SD=0.20$)，高群体认同者经历外群体消极评价后有更多的内群体积极行为($M=5.76$, $SD=0.18$)， $F(1, 68)=50.18$, $p<0.001$, $\eta^2=0.27$ ；而低群体认同者在内群体消极评价和外群体消极评价后的内群体积极行为表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16$)。

最后，以消极评价的来源身份和群体认同为自变量，消极情绪反应为中介变量，内群体积极行为为因变量，进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消极情绪反应对内群体积极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eta=0.66$, $t=9.58$, $p<0.001$)，来源身份和群体认同交互项的预测作用减少且不显著($\beta=0.10$, $t=1.77$, $p=0.08$)，表明情绪反应的中介效应显著，群体认同对来源身份的调节作用能够通过情绪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内群体积极行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成立（见表 1）。间接效应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当群体认同高时，情绪的中介作用显著([0.28, 0.58])，而群体认同低时，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0.07, 0.16])，表明对于群体认同水平高的个体，来自外群体的消极评价通过激活消极情绪反应对内群体积极行为产生间接的正

向影响,而对于群体认同水平低的个体,情绪并没有中介消极评价来源身份和内群体积极行为之间的关系。

补充实验的结果与原来正文中的实验结果相同:群体认同对来源身份的调节作用能够通过情绪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被试的内群体积极行为。这进一步确认了本研究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结果是确实可信的。参考评审专家的建议,为了控制“描述性的群体规范”,让研究更加严谨,我们在修改后的正文中用补充的实验替换了原有实验,文中具体修改如下:

“4 实验 3 群际敏感效应的行为表现:群体认同和情绪的作用

4.1 目的

以内群体积极行为作为行为表现的指标,考察不同来源身份的群体消极评价和群体认同对内群体积极行为的影响,以及情绪的中介作用。

4.2 方法

4.2.1 被试

随机选取某地区高校大学生 138 人,其中男性 43 名,女性 95 名,平均年龄 21.59 岁($SD=2.42$)。

4.2.2 实验设计

采用 2(来源身份:内群体、外群体) \times 2(群体认同:高认同、低认同)组间设计,因变量为被试的消极情绪反应和内群体积极行为。

4.2.3 实验材料与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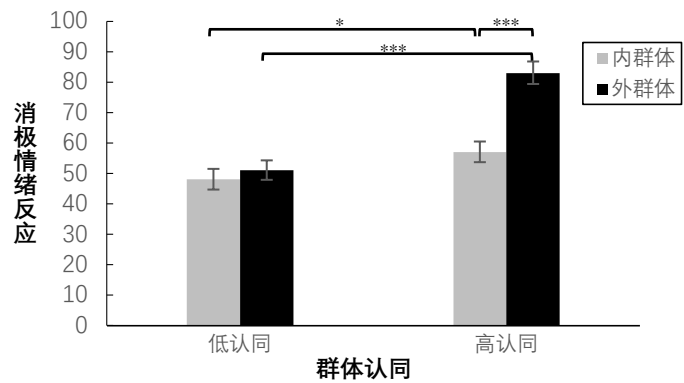
告知被试本研究为对学校满意度的调查,首先让被试填写自己学校的名称,然后对学校的认同程度进行评分,随后呈现一则网上由本校(或外校)学生对其学校的消极评价,询问被试对于上述评价的情绪感受,在“生气的、难过的、恼怒的、受侮辱的”四种情绪体验上进行 0~100 评分,最后进行内群体积极行为的测量。研究采用内群体积极行为作为行为反应的指标,内群体积极行为的测量改编自 Garcia, Weaver 和 Moskowitz(2002)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阅读材料为“现在想象你已经从学校毕业,并且工作许多年了,你的经济收入处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你愿意把你每年收入的多大比例捐献给母校的教育发展事业呢?”请被试在 1(0%)~8(25%及以上)之间估计可能的选择。群体认同和消极情绪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88 和 0.90。

4.3 结果

依据被试群体认同的平均数为临界值,将被试分为高认同($n=69$, $M_{\text{高}}=5.62$, $SD_{\text{高}}=0.58$)和低认同($n=69$, $M_{\text{低}}=3.91$, $SD_{\text{低}}=0.63$)两组,两组被试的群体认同得分差异显著, $t(136)=16.49$, $p<0.001$, $d=2.82$ 。

以消极评价的来源身份(内群体、外群体)和群体认同(高认同、低认同)为自变量,被试的消极情绪反应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来源身份的主效应显著, $F(1, 134)=31.88$, $p<0.001$, $\eta^2=0.19$, 来自外群体评价的消极情绪反应显著高于对来自内群体评价的反应;群体

认同的主效应显著, $F(1, 134)= 66.25, p < 0.001, \eta^2= 0.33$, 高群体认同个体的消极情绪反应



显著高于低群体认同的个体;来源身份和群体认同的交互作用显著(见图3), $F(1, 134)= 14.95, p < 0.001, \eta^2= 0.14$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群体认同者对来自外群体消极评价的消极情绪($M=83.80, SD=2.46$)比对来自内群体消极评价的消极情绪($M=57.63, SD=2.64$)反应更加强烈 $F(1, 68)= 52.65, p < 0.001, \eta^2= 0.28$;与实验2结果一致,低群体认同者对两种来源引起的消极情绪反应不存在差异($p = 0.47$)。

图3 不同来源身份和群体认同条件下的消极情绪反应

注: * $p<0.05$, ** $p<0.01$, *** $p<0.001$

同样,以消极评价的来源身份和群体认同为自变量,被试的内群体积极行为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来源身份的主效应显著, $F(1, 134)= 36.24, p < 0.001, \eta^2= 0.21$, 外群体消极评价会导致更多的内群体积极行为;群体认同的主效应显著, $F(1, 134)= 32.16, p < 0.001, \eta^2= 0.19$, 高群体认同个体的内群体积极行为显著高于低群体认同的个体。重要的是,来源身份和群体认同的交互作用显著(见图4), $F(1, 134)= 16.09, p < 0.001, \eta^2= 0.10$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相比经历内群体消极评价后的内群体积极行为($M=3.90, SD=0.20$),高群体认同者经历外群体消极评价后有更多的内群体积极行为($M=5.76, SD=0.18$), $F(1, 68)= 50.18, p < 0.001, \eta^2= 0.27$;而低群体认同者在内群体消极评价和外群体消极评价后的内群体积极行为表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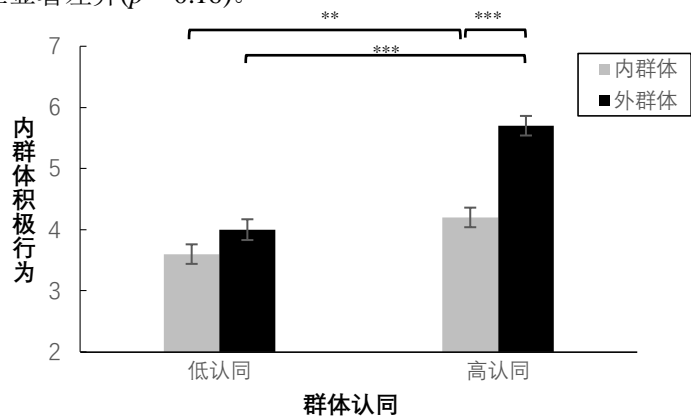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来源身份和认同条件下的内群体积极行为

注: * $p<0.05$, ** $p<0.01$, *** $p<0.001$

实验 3 再次证明消极评价来源身份和群体认同对个体的消极情绪反应存在交互的影响，并且这种交互作用在内群体积极行为表现上也同时存在，考虑到两者的相似影响，进一步探索情绪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采用回归分析和 PROCESS 宏程序中的模型 8 对上述变量进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Hayes, 2013)。

表 1 消极评价来源身份对内群体积极行为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因变量: 内群体积极行为)			(因变量: 消极情绪)			(因变量: 内群体积极行为)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来源身份	0.44**	0.06	6.88	0.35**	0.06	5.64	0.21**	0.06	3.81
群体认同	0.39**	0.06	6.20	0.51**	0.06	8.28	0.06	0.06	0.96
来源身份*群体认同	0.29**	0.06	4.33	0.28**	0.06	4.62	0.10	0.05	1.77
情绪反应							0.66**	0.07	9.58
R^2	0.45			0.48			0.67		
F	36.38**			41.98**			68.77**		

注: * $p < 0.05$, ** $p < 0.01$ 。

结果验证了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见表 1），来源身份和群体认同的交互项对内群体积极行为($\beta = 0.29, t = 4.33, p < 0.001$)和消极情绪($\beta = 0.28, t = 4.62, p < 0.001$)的预测作用均显著（方程 1 和方程 2），说明群体认同调节了消极评价来源身份对个体消极情绪反应和内群体积极行为的影响，与方差分析结果一致；将中介变量纳入方程（方程 3）后，消极情绪对内群体积极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eta = 0.66, t = 9.58, p < 0.001$)，来源身份和群体认同交互项的预测作用减少且不显著($\beta = 0.10, t = 1.77, p = 0.08$)，表明情绪反应的中介效应显著，群体认同对来源身份的调节作用能够通过情绪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内群体积极行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成立（见图 5）。进一步考察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发现，当群体认同高时，情绪的中介作用显著([0.28, 0.58])，而群体认同低时，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0.07, 0.16])，这表明对于群体认同水平高的个体，来自外群体的消极评价通过激活消极情绪反应对内群体积极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而对于群体认同水平低的个体，情绪并没有中介消极评价来源身份和内群体积极行为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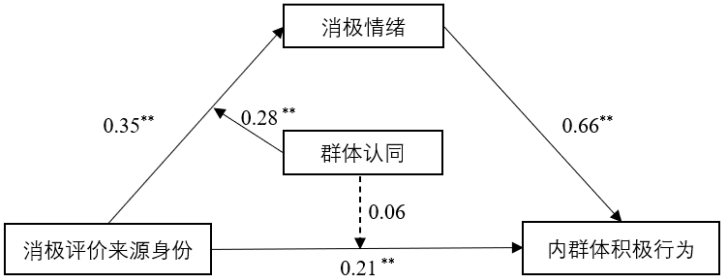


图 5 消极评价来源身份对内群体积极行为的有中介的调节路径图

注: * $p<0.05$, ** $p<0.01$

意见 3: 讨论中认为研究结果有助于应对“中国威胁论”造成的影响,但既有内容中并未涉及过该方面的论述,研究者是否需对此进行展开说明或做出删减?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建议!本研究发现高群体认同者对待外群体的批评有更消极的情绪反应和更积极的内群体维护行为,其现实意义在于在当前国际群际关系复杂矛盾丛生的背景下,可以帮助国人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外群体的消极言论,更加明确自身的情绪反应和认知行为规律。因此“中国威胁论”的提法确实有些抽象,应具体到“应对来自外群体消极评价”的启发。**文中具体修改如下:**

“本研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群际敏感效应的首次探讨,从群体认同的视角考察消极群体评价对个体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群际互动中个体的心理及行为反应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基于群体身份的重要作用,发现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及其行为表现产生重要影响,高群体认同者面临来自外部的群体威胁时,会出现更加负面的应激情绪反应,同时也会产生更多维护内群体的行为。此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世界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在国际群际关系矛盾丛生的现实背景下,研究消极群体评价对个体心理及行为的影响,明确群体认同的作用,倡导采取理性态度看待来自外群体的言论报道,保持清醒头脑,对稳定社会情绪,培养良好的社会心态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修改稿很好地回答了我关切的问题,个人认为已经达到发表要求,建议接收并发表。

.....

编委意见: 同意修改后发表。

主编意见: 认真看过,同意发表。